

二十一世紀評論

科索沃危機引起的反思

以歐洲的名義阻止納粹悲劇重演

- 格魯克斯曼
(André Glucksmann)

科索沃戰爭引起了很多爭論，導致西方國家傳統的意識形態派別發生分裂甚至重組。比如說，傳統上反對越南戰爭的知識界甚至政界人士，此次就支持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干預。而更多的右翼人士，在法國是比戴高樂更偏右的人士，則反對這一干預。



格魯克斯曼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70年代法國「新哲學」潮流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國典型「干預型」(engagé)知識份子。從70年代開始，他就活躍於反極權、反越戰，甚至反對啟蒙傳統中將理想強加於社會的政治偏見等活動中。他的學術建樹表現在其將戰爭、極權、激情、愛滋病等現象納入哲學思考，拓新了哲學範疇。主要著述有：*Le discours de la guerre, 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 Les Maîtres penseurs, Cynisme et passion, Le XI^e Commandement, La fêlure du monde*。

1999年7月，本刊委託陳彥生先生就科索沃問題訪問了格魯克斯曼。下面▲代表本刊的提問，■代表格魯克斯曼的回答。

▲ 科索沃戰爭無疑是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戰爭提出了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如主權與人權、強權與公理等。您是一位十分關注這一戰爭的有影響的哲學家，我們很想聽聽您的分析。

■ 這一戰爭引起了很多爭論。這些爭論不僅遍及整個西方國家，而且遍及各政治派別。傳統的意識形態派別發生分裂甚至重組，比如說，傳統上反對越南戰爭的知識界甚至政界人士，此次就支持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干預。而更多的是右翼人士，在法國是比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更偏右的人士，則反對這一干預。實際上在東西冷戰時表現十分強硬的人、反共產主義的、持民族主義立場的人，此次似乎成為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的狂熱崇拜者。在美國，共和黨領導人甚至引用貝茲 (Joan Baez) 的反越戰歌詞來反對干預科索沃，而在當時，共和黨人主張將反戰的貝茲送入監獄。

我本人對南斯拉夫的立場一直沒有變。自我於1991年在前南斯拉夫看到了塞爾維亞軍隊炮擊平民區，看到軍隊殺害無辜百姓，我就明白到這不是一場內戰，而是一場軍隊攻擊平民的戰爭。在波斯尼亞，塞族軍隊炮擊墓地，槍擊醫院，以達到改變邊界、改變權力布局、驅逐異族的目的。科索沃所發生的事，正是我們所見的十年來在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事。這是一場沒有兩軍對峙的戰爭，這是一場迴蕩着被困、被圍、被殘殺的城市和村莊的名字的戰爭，而圍困這些城市和村莊的，正是南聯盟的正規軍。從這一天起，我就主張利用各種手段制止這種事情發生：外交壓力、輿論抗議、經濟制裁，甚至不惜動用軍事手段，為的是保護平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對我來說，北約的干預有兩個弱點：一是干預太晚，一是干預力度過弱。如果北約在一開始就強烈干預，這一行動持續的時間就會更短，就會較為有力地避免塞族軍隊與警察進行種族清洗，將一半以上的阿爾巴尼亞族人趕出科索沃。

1991年12月，我同十幾位歐洲知識份子，其中包括今天已故世的戲劇家尤內斯庫 (Eugene Ionesco)，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 上發表公開信，要求當時正在馬斯特里赫召開峯會的歐洲各國領導人，就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 暴行發表一個共同聲明：在歐洲領土上禁止炮擊平民。假如當時歐洲領導人通過了這樣一個聲明，其後的波黑和科索沃的暴行很可能就不會發生。

▲ 您既然主張對南斯拉夫進行武力干預，那麼您的依據是甚麼？以甚麼名義對科索沃進行干預？以人權的名義？以歐洲的名義？

■ 我們可以說是以人權的名義，但首先是以歐洲的名義。1945年後誕生的新歐洲，是奠基於對希特勒與斯大林暴政的拒斥之上的。歐洲最後一次強迫平民遷徙的暴行是二戰末期斯大林強行遷徙一千萬德國人，他們顯然並非都是納粹份子。在此前，希特勒犯下了更為殘忍的罪行。歐洲共同體正是要確立這樣一個原則：人民有權在其出生之地生活。法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是三個在二戰中受納粹蹂躪的國家，波、捷兩國尤為慘烈。這三國同德國的和解正是在這樣一個原則之

主張對南斯拉夫進行武力干預可以說是以人權的名義，但首先是以歐洲的名義。歐洲共同體要確立這樣一個原則：人民有權在其出生之地生活，當然更不得屠殺平民。這是民主歐洲的基本原則之一。可以說，對科索沃的干預，正是基於歐洲的合法性，為了防止歐洲再度墜入1910-45年這種自殺的戰爭。

上達成的。任何人不得強迫民眾遷居，當然更不得屠殺平民。德國在戰後請求了寬恕，這同日本人不一樣。一直到現在，日本對南京大屠殺的態度仍然曖昧。德國深深地承認其所犯的罪行，兒童在學校接受這一觀點的教育。同時，波蘭人也向德國人請求饒恕，這一點也許中國人不太了解，因為波蘭在1945-46年間也強迫流放德國平民。波蘭請求饒恕是波蘭天主教主教在70年代作出的，而當時波蘭的共產主義政權是不同意的。同樣地，捷克在1989年「天鵝絨」革命之後，被選為總統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到德國向德國人請求寬恕，因為1945年捷克將蘇台德地區的德裔農民驅趕出境。所以，禁止向平民發動戰爭是歐洲和解的原則，是民主歐洲的基本原則之一。這是歐洲民主、歐洲聯合的先決條件。

當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於1991年發動這樣一場戰爭的時候，歐洲政界手足無措，但公眾則極其厭惡。一部分知識界人士則到實地考察，漸漸影響大眾輿論。人們很快就意識到，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事實實際上危及整個歐洲戰後的秩序，動搖歐洲聯合的原則。所以，我們可以說，對科索沃的干預，正是基於歐洲的合法性，為了防止歐洲再度墜入1910-45年這種自殺的戰爭，儘管這一干預有些過晚。

米洛舍維奇希望將俄國與中國拉入一場新的冷戰中去。對於俄國，他以泛斯拉夫主義相引誘；對於中國，他以反美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為號召。但俄國人和中國人都意識到其本國的國際戰略並不是由米洛舍維奇來決定的。

▲ 如果說對科索沃的干預是以歐洲的名義進行的話，那麼怎樣解釋美國的參與？

■ 美國同歐洲各國政府一樣，開始是根本不願意干預的。捷克總統哈維爾最先意識到南斯拉夫問題並非一個局部的問題，他認為這是一個威脅到整個歐洲的問題，事關歐洲的命運。漸漸地，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之下，歐洲政府開始感到羞恥，因為有人在歐洲的中心任意殺戮平民，也為一個如薩拉熱窩這樣的城市被包圍五年而羞恥。在薩拉熱窩，軍隊不僅在周圍的山上向市內炮擊，而且一些職業射手更以槍擊出門打水、買麵包的孩子為樂。這種局面實在是歐洲的羞恥。傳媒長期報導波黑事件，公眾壓力日益擴大，逼迫歐洲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歐洲政府的態度使得美國政府面臨選擇，要麼參加，要麼反對。美國也有少數知識界人士、記者指出，歐洲一旦發生戰爭，回到本世紀上半葉那種狀態，美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但是美國離科索沃很遠，有大西洋相隔，美國此次決定干預，簡直近乎奇迹。美國政府如果決定不干預，美國輿論也不會有太大的反對之聲。

伊拉克戰爭有石油資源，伊拉克的飛彈也可以打到以色列去，有一個關係到全球戰略的問題，科索沃既無資源，也沒有可以影響世界的其他因素。歐洲的和平、平民的生命是歐洲政府干預的原由，也是美國干預的原由。

▲ 有人認為，美國干預的實際目的是要抑制歐洲、阻止歐洲聯合的進展。

■ 抑制或阻止歐洲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讓這個癌症長期留在歐洲的心臟。南斯拉夫危機自然會牽動整個巴爾幹地區，塞爾維亞的周邊國家如阿爾巴尼亞等是不能長期容忍本族同胞被屠殺的。這即是說，如果沒有北約干預，歐洲中部就將會有一個類似於塞浦路斯、巴勒斯坦或者克什米爾的局勢，歐洲的心臟地區就會長期留存一個恐怖主義、游擊戰爭的衝突之源。對於美國來說，再也沒有

比這更為理想的削弱歐洲的途徑了。美國此次出兵干預，是幫助了歐洲，而不是削弱了歐洲。

▲ 怎樣理解俄國甚至中國在這一行動中的角色和反應？

■ 對於俄國與中國來說，此次戰爭確實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米洛舍維奇的用意十分清楚，他希望將俄國與中國拉入一場新的冷戰中去。對於俄國，他以泛斯拉夫主義相引誘；對於中國，他以反美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為號召。俄國人曾經猶豫，但終於沒有選擇米洛舍維奇的方向。俄國人和中國人都意識到其本國的國際戰略並不是由米洛舍維奇來決定的。中國人其實可以向南斯拉夫提供導彈，但卻沒有這樣做。

在當今世界中，發動戰爭要比締造和平容易得多，任何一個小獨裁者都可以發動戰爭，但要加強和平則非易事。難道任何一個小獨裁者都可以以反美國霸權的名義將俄國、中國這些大國引入一個新冷戰之中嗎？幸運的是，米洛舍維奇這次沒有成功，但我們並不能保證這類嘗試永遠不會成功。我想中國是知道目前世界局勢平衡的脆弱性的。在二十一世紀，發動戰爭、打破地區穩定的能量日益普及，小國家越來越容易掌握先進的武器。這些國家可以發動戰爭，卻不可以維護和平。北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北韓一面面臨着空前未有的大饑荒，一面卻有雄心勃勃的核武計劃。朝鮮的局勢、印巴克什米爾衝突同中國都有關係。一股狂熱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對印度、對中國新疆都是重大威脅。我希望作為一個大國的中國，應該將盡量避免捲入地區衝突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國策。但我對此並沒有十足的信心。

▲ 即使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犯下了種族清洗罪行，但北約的行動則是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是一種破壞國際現行秩序的行為，同時，對南斯拉夫的干預是對南斯拉夫主權的侵犯也是不爭的事實。

■ 是的，南斯拉夫的主權確實被打破了。國際社會也確實有一個尊重各國主權完整的傳統，但是並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現存秩序，國際法規也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尊重主權是國際法理規則，但也有其他國際法規、國際公約，如關於反人類罪、反戰爭罪、反宗教迫害、反酷刑等等的規定。要使這些規則都獲得遵守，顯然是互有衝突的。在世界範圍內，是不存在類似於在一個國家內部那樣清晰的一套制度秩序的，國際上並沒有一套清楚的制度規定，如法庭、軍隊、警察、憲法等。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們注意到有一些犯罪行為超出了民族國家主權合法性的範圍。比如說，納粹德國在其國內所犯下的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是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審理的。這一審判向世人宣布，主權合法性既不能成為反人類罪的辯辭，也不能洗清這類罪行，更不能為反人類罪提供合法依據。這就是紐倫堡國際法庭將一些納粹戰犯判以絞刑的原因。日本其實也應該接受國際審判，但遺憾的是，國際社會並沒有對日本採取同樣的作法。

對南斯拉夫的干預是對南斯拉夫主權的侵犯，這是不爭的事實。尊重主權是國際法理規則，但也有其他國際法規、公約，如反人類罪、反戰爭罪、反宗教迫害、反酷刑等等的規定。要使這些規則都獲得遵守，顯然是互有衝突的。主權合法性既不能成為反人類罪的辯辭，也不能為反人類罪提供合法依據。

經過二戰的教訓，人們本以為此類問題會得到避免，但事實告訴我們，反人類罪仍在繼續。冷戰期間，柬埔寨發生了滅族大屠殺，聯合國完全無力制止。這一屠殺為越南的軍事入侵柬埔寨所制止，當然，越南並非出於人權的目的。後來，聯合國在譴責越南入侵的前提下，決定對柬埔寨進行干預，以制止屠殺，保獲平民。這一行動也是一種打破國家主權的行動，雖然國際輿論對此沒有明言。實際上，現在國際上形成這樣一種局面：面對一個極為嚴重的屠殺民眾的罪行，誰來首先制止這一罪行，誰就有理。這並非一個國際警察的規則，因為根本沒有一個國際警察。美國並沒有制止柬埔寨的屠殺，中國也沒有制止柬埔寨的大屠殺。美國或者中國其實是有能力制止的。這不是警察制度，而是一種消防隊救火的辦法。火災發生了，消防隊員來救火，是合法的。

北約的此次行動是符合人權的，但不等於北約代表着人權；美國也不代表人權。代表人權的是一次制止種族屠殺的行動，而不是某一政府、國家。我以為，人權是反對非人類、非人道的行動，任何人均無權取消別人的生活權利。

另外一個例子是盧旺達。盧旺達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種族屠殺。在十個星期內，上百萬的平民被殺，他們之所以被殺，僅僅是因為他們生下來就屬於圖西族人。這場屠殺其實只需五千士兵就可以制止，但聯合國沒有行動。這場屠殺是由加加梅將軍 (Paul Kagame) 所制止的，加加梅本人或許也是一個戰爭罪犯，但其制止屠殺的行動則被國際社會在事後承認。美國總統克林頓 (Bill Clinton) 曾向盧旺達人民請求原諒，因為美國沒有干預制止屠殺。

科索沃問題也屬於這一類。由於聯合國對此不干預，北約出來制止了這一反人類罪、種族清洗罪。科索沃阿族人被驅逐、被屠殺僅僅是由於他們生而為非塞爾維亞人。聯合國如能出面固然好，如果不出面，一個地區軍事集團出面制止這一罪行也是正常的、合法的。使這種干預行動合法化的，正是這種慘絕人寰的反人類暴行。這種行動並非是以某種理想的名義、以世界權威的名義來進行的，而僅僅是一件撲滅危及人類、或一部分人類生存的火災的行動。這就是消防隊的救火功能。此次北約干預制止了科索沃的種族清洗，其行動是合法的。但這既不等於說消防隊在其本國或在其他情況下沒有問題，也不等於說北約今後的行動就一定正義。消防隊並非道德天使。

▲ 在這種背景下，怎樣理解人權？北約乃至美國是否代表着人權？您曾經提出「惡的力量」的概念，能否用來解釋此次科索沃戰爭？

■ 北約此次的行動是符合人權的，但不等於北約代表着人權。美國也不代表人權。美國支持阿富汗的達里班學生軍就是一個錯誤，甚至是一種罪行。代表人權的是一次制止種族屠殺的行動，而不是某一政府、國家。我以為，人權是反對非人類、非人道的行動，而不是將人提昇為理想的人。今天科索沃人將能夠有權像其他人一樣生活，但並不因此就提昇了他們的道德水準。他們中間會有罪犯，會有腐敗份子。他們的人權就是他們能夠同其他人一樣生活，而任何人均無權取消他們的這種生活權利。

我不是道德主義者，我並不關注人是否能夠進入天堂的問題。這是宗教或意識形態關注的問題。人要進天堂，就要求合乎天堂的標準，由於天堂的標準不一樣，就可能發生衝突。天堂標準無法統一，但我們卻可以較容易就地獄的概念獲得共識。在二十世紀，地獄的概念是甚麼？是集中營，是種族滅絕，是

強迫兒童工作，是殺人的地雷等等。這種以多種形式存在的地獄，是一個較容易溝通的概念。中國人也許認為美國就是這種地獄，而美國也許認為共產主義是地獄。但對於一個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來說，不管這一集中營是希特勒的、是斯大林的、是狂熱伊斯蘭的、還是其他極端民族主義的，集中營中這一囚犯的境況並沒有甚麼不同。集中營囚犯的經驗是世界共同的。同樣的，很多人都具有殺人的、迫害人的衝動，這也是世界共通的，即是說，同善相比，惡更具有世界普遍性。善的普遍性僅僅是人類具有共同反對惡的本性，因而所謂普遍的善，其實就是反對普世的惡的善。善是抵抗惡的大堤。只有築起盡可能多的善的大堤，才能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

德國目前的情況很能說明這一點。德國綠黨領袖費舍爾 (Joschka Fischer) 現在是德國外長，他是我三十年來的朋友。費舍爾表示，當塞爾維亞姆拉吉奇 (Ratko Mladic) 將軍在電視鏡頭之下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殺約一萬人的時候，費舍爾對綠黨表示：「我既反美，又反北約、反戰，我也反對德國軍隊參與任何國際行動。我曾經堅決反對越南戰爭，我也上街遊行反對美國等等。我沒有變，我仍然反對戰爭，但是我也反對比戰爭更壞的罪行，而且傾我一生竭力反對——我反對奧斯威辛 (Auschwitz) 納粹集中營。當一個軍事將領在電視鏡頭前將男人與婦女、兒童分開，三天之後，男人全被槍決，婦女、兒童中一部分被槍決，我們知道將發生甚麼事。這自然還不是奧斯威辛，但奧斯威辛則是從此開始的。我們德國人應該知道甚麼是『最惡』。為了制止這個『最惡』，為了使奧斯威辛不再重演，儘管我反北約、反美、反戰，但我主張干預，主張進行有限戰爭，主張德國軍隊參與國際行動。」這一立場，曾經使費舍爾成為德國綠黨的少數派。但今天作為德國外長，費舍爾正是實行這一原則。

現已被聯合國秘書長任命為科索沃國際託管政府負責人的法國衛生部長庫什內 (Bernard Kouchner) 也表白了同樣的意思。1969年，他作為醫生在尼日利亞進行人道救援時見到種族滅絕暴行時就表示：「我沒有經歷納粹集中營，沒有經歷紅色高棉大屠殺，正是因此我們應該干預。因為我們曾經沒有能夠制止對平民的屠殺，所以現在必須制止這種屠殺。」

也許這些是歐洲的故事，是歐洲的命運，離中國似乎較為遙遠。但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在亞洲某地發生種族大屠殺，日本人表示，我們曾經在南京犯了屠殺罪，我們曾經是罪人，正是因此，我們要制止這種屠殺再次發生。如果有這種情況，中國人也許不難理解。中國也應該制止這類屠殺罪，因為中國人曾經經歷了南京大屠殺。

科索沃的情況使歐洲人回想起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暴行，這是歐洲人主張武力干預的歷史動因，也是北約干預的最基本動力。

陳彥 譯

科索沃的情況使歐洲人回想起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暴行，這是歐洲人主張武力干預的歷史動因，也是北約干預的最基本動力。也許這些是歐洲的故事，是歐洲的命運，離中國似乎較為遙遠。但中國人也許不難理解這些情況，因為中國人也曾經經歷了南京大屠殺。